

新中国七十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与理论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 70 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的伟大实践经验，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光荣使命。为了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实践经验，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于 2019 年 5 月 26 日联合举办了“新中国 70 年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研讨会”。我们整理了本次研讨会中部分专家学者的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前 30 年和后 40 年

林 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今年我们的新中国已建立 70 年。70 年前的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内忧外患交织，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国家的工业化可以说还没有起步，民族资本主义极其弱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远未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统治地位。

从当时我国自身的社会条件来看，社会主义在我国并不是承续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较充分发展而出现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继起的关系。社会主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更像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实现和发展的。但是，到了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对于在此前一个世纪的产业革命中落后的国家来说，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基本被封死。中国是在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替换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全球取得统治地位，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已经形成了以少数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全球化不是最近二十年才有，全球化可以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和发展的。《共产党宣言》里面就有关于全球化的非常好的论述。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如何变革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一书里就讲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里面就阐述了全球化的理论。在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处在外围和边缘。按照拉丁美洲学派的一些学者的总结，外围依附于中心，中心通过对资本和技术的垄断来控制外围，外围或边缘的不发达成为中心国家发达的条件。从鸦片战争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靠政府支持的武装贩毒打开我国的大门，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列强在我国划分势力范围，占领我国的市场，与军阀和官僚买办相勾结，掠夺我国的金银和自然资源，加速其本国的资本积累。在这种历史格局下，我国是注定走不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是资本主义强国所不能容许的。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碰壁无数，成效甚微。挫折之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将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转向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最早注意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很有可能是旧民主主义的代表孙中山先生。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 1896 年在伦敦蒙难被救出来，看到英国生产力这么发达却有那么多处于赤贫状态的劳动者，感到非常荒谬，跟身边的留学生说，要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看看里面怎么说的，还要注意社会主义刊物。他在 1924 年讲新三民主义时，在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中，还专门谈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孙中山没有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成为中国人民的选择。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这种选择以极大的激励。中国人从自己的国家在近代遭受的深重苦难中认识

到，要从西方中心国家的控制和压迫下解脱出来，保障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其他通途。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是就我国自身生产力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而言的。但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矛盾，前者对后者的统治和压迫关系，毕竟是我国这样的暂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或者说，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所包含的中心和外围之间矛盾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来说，又具有继起的关系。光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关系，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继起关系，也是不全面的。事实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关系具有双重性：既是替代的，又是继起的。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使我们能够摆脱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独立自主地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之后，我们才有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本钱，才能够和西方国家平等地展开经济交往，进行对外贸易和投资，通过互利的经济合作，利用发达国家在发展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积累起来的技术经济成果，逐步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与社会主义的要求相适应的水平。美国现在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感到恐慌，跟我们打贸易战，从技术上围堵我国的企业，正好从反面说明我们以前的道路选择对了，确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把我们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压迫、被统治的关系中带出来，能够使我们真的像毛泽东主席说的那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边缘逐渐走上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

我们的新中国 70 年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 30 年和后 40 年。前 30 年实行计划经济，后 40 年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近平同志强调，不能用后 30 年来否定前 30 年，也不能用前 30 年来否定后 30 年。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一段时间以来，确实有人用后 40 年来否定前 30 年，鼓吹现在实行改革开放证明前 30 年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搞错了，中国本来就应该跟在西方国家后面走资本主义道路。持这种主张的人，不了解中国和世界的近代史，对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似乎也一无所知。有些鼓吹这种观点的“公知”其实是在配合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实行颜色革命的企图。这些人的种种言论，不过是西方学者的牙慧。被某些人奉为神圣的罗纳德·科斯的最后一本书的英文原名就是“*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这本书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总结成了搞资本主义。将自己是科斯的学生挂在嘴上的某个香港人，“在马克思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根钉子”

之后，据说也学他老师的样，正在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总结成通向资本主义之路。在这类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眼里，共和国的前 30 年共产党一件好事也没干。但是，如果没有前 30 年奠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前 30 年的艰难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就不会有后 40 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对于我们共和国的前 30 年，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即便是被某些人视为万恶之源的集中计划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工业化也是起过巨大推进作用的。在建立之初的新中国，不存在现代工业体系，有的只是零零星星的面粉厂、铁工厂、火柴厂、纺织厂。要在这个基础上，依靠既有企业的逐利行为，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发展出一个现代工业体系，没有个几百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是国家不会遭受外部干涉，不存在外敌入侵的威胁，国家不会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事实上，背负民族复兴的紧迫任务的共产党人，当时面对的是绝非良好的国际环境，因而没有重复英国走过的那种自下而上的“曼彻斯特道路”的可能。中国的工业化是执政的共产党人自上而下发动的。在一个个行业和部门都要从无到有建立的情况下，工业部等经济管理机构的设置必须先于生产企业的建立。千千万万的企业是由这些管理部门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的，数以亿计的工人、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是由这些管理部门从先前的农民中训练出来的。这种创建活动所需资源是通过中央计划机构集中起来、分配出去的。靠着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国民经济结构和人民的需要都比较简单的情况下，计划经济的运转是顺畅的，成效也是显著的。只是到了经济结构较为复杂，人民的需要由温饱而变得多样时，计划经济就不行了，出现了信息问题，为革命激情所抑制和掩盖的利益和激励问题也凸显出来，经济运行机制变得僵化低效。这时，市场导向的改革就提上了日程，改革开放成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后 40 年发展的推动力。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由自上而下的发动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扩张和发展。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前 30 年和后 40 年是统一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互相衔接、不能分割的两个发展阶段。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种发展进程，是西方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但是，不仅西方某些学者，而且我国一些所谓经济学人，总是试图将我国活生生的现实硬塞进他们自己的理论框架，想要将中国的实践变成他们的错误理论的案例。对于其中包藏的不良居心，我们要保持应有的警惕。